

南京生物学博士情侣 婚礼上交DNA信物

本报讯 婚礼上都会有交换结婚信物的程序,近日在南京华东饭店举办的一场婚礼上,两个生物专业的博士情侣提取出自身的DNA,作为信物现场交换。

婚礼上,新娘与新郎每人手持一个管状容器走上舞台,管状容器里盛有一毫升左右的透明液体,这便是两人的DNA溶液。两人将两管溶液混合在一起,摇晃均匀。新郎介绍说,他们提取了各自的口腔黏膜和头发,通过专业仪器把体细胞破碎后用化学方法把DNA溶解在水里带回国。新娘说,把DNA溶液混合在一起,意味着在生命中你中有我,永不分离。

据《北京晚报》

广州番禺一市民家中 电视遥控器突然爆炸

本报讯 手机电池爆炸伤人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,但电视遥控器的电池爆炸您听说过么?日前,居住番禺区小谷围穗石村的韦先生家里就出现了这种怪事,电池芯也被完全炸出,所幸并没有人受伤。

记者接报后来到韦先生家里,只见床上散落堆放着几块破碎的零件,整个遥控器已经被“炸”得四分五裂;前后盖完全分离,中间的电路板也被剥离出来,旁边两节七号电池中,有一节已经炸坏,只剩下圆筒状的电池金属壳和里面的电池芯。

“把我们吓坏了!”韦先生回忆事发时的一幕,依旧心有余悸。据他介绍,26日晚上10时左右,他正半躺在床上看电视,电视机遥控器就放在身旁,看着看着,身旁就传来“啪”的一声。“就好像在身边放了鞭炮。”“妻子当时在睡觉,差点从床上跳起来,一直问‘怎么了?’”韦先生定睛一看,原来遥控器已经四分五裂。

韦先生介绍,这两节七号电池是此前从附近市场里小卖部买的,用了还不到两个月,按照电池上的标识,要到2008年8月才过期。到底是遥控器电路问题还是电池本身的质量问题引起的爆炸,他表示自己也不清楚。

据《广州日报》



胡星案“行贿状元”至今未被公诉

专家认为,目前行贿非罪化、量刑畸轻化趋势严重

本报讯 5个半月——胡星案完结至今的时间,由胡星案牵出的官员、行贿者多数都已受到法律的制裁,然而被当地媒体戏称为“行贿状元”的陈族远之案直到现在仍然音信全无。

自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案发后,其中“行贿状元”陈族远行贿3200万元。但据当地记者透露,至今“行贿

状元”一直被取保候审,未被提起公诉。

据专家介绍,目前行贿非罪化、量刑畸轻化趋势严重。有些人认为行贿者多是出于“被逼无奈”,从另一角度来说也是“受害者”,应从法律和道德上皆给予“宽容”。但有关专家介绍,行贿者普遍会获得10倍于投入的回报,也就是说,

“行贿”的回报是投入的1000%。

该专家认为,行贿和受贿是“一根藤上的两个瓜”,互为因果关系,但在司法实践中,两“兄弟”却越走越远,受贿案的刑罚力度处于不变的情况下,行贿案件的量刑却在越来越轻,剪刀差在日益扩大。

据《法制日报》

“地产教父”王石： 40岁前不要买房

本报讯 “对于那些事业没有最后定型,还有抱负、有理想的年轻人来说,应该在40岁之前租房为好。”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27日再度抛出惊人观点。

继去年年末抛出“楼市出现拐点”之后,有“地产教父”之称的王石27日再度站到聚光灯下。在参加门户网站访谈节目时,王石表示,买房

虽然能给人带来安全感,但对于正在创业阶段的年轻人来讲,房屋将在转换工作时期成为一种负担,而国外大城市20多岁就买房的年轻人很少。

事实上,随着近期部分城市商品房成交量下降,楼市观望气氛日渐浓厚,楼市已现拐点的声音渐强。不过,反对的声音同样

鲜明,认为楼市在经历紧缩式调控的短暂低迷之后,必会迎来报复性上涨。但王石27日仍坚定地坚持自己的判断,认为此次楼市的调整与紧缩式的货币政策关系不大。

王石表示,在本轮调控中,万科在广州、深圳等地的楼盘率先降价,市场反应不错,说明房价调整并非完全因为宏观调控,而是一种理性回归。“房价已跟居民收入增长脱钩太远,有些甚至出现地比房价还高,‘面粉比面包还贵’的非理性现象。因此,即便没有宏观调控,价高量缩,房价最后也会下降,趋于理性。”

据《北京晨报》



灰袋鼠产下白色仔 宁波的稀罕事 世界尚属首例

本报讯 在野生动物界,白狮、白虎等白色的动物一般都比较珍贵。在宁波雅戈尔动物园,一只雌性灰袋鼠产出一只雄性白色袋鼠,并将在春节期间与游客见面。专家认为,这在国际上尚属首例,若是白色基因稳定下来,此举也将创造一个新的动物品系。

由于尚未进行专业鉴定,这只袋鼠目前只能暂定为白色灰袋鼠。据《都市快报》

大学生自建“砍价网” 买东西至少便宜20%

本报讯 市场价5290元的空调,有了它,只需4290元就能搬回家。“我希望它能成为沈阳人最实用的网站。”26日,沈阳航空工业学院机械系大四学生刘皓谈起自己创办的“沈阳砍价网”颇有成就感。

谈起创办“砍价网”的初衷,24岁的刘皓告诉记者,在大学期间,他一直在课外从事家电等商品的销售工作,而创建“砍价网”是为了把自己多年来掌握的各种价格信息反馈给消费者,让消费者分享他对价格研究的成果。

在网站上,他还设置了砍价论坛,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砍价交流平台。刘皓认为,

砍价服务跟团购有所不同,虽然二者都是为消费者提供价格优惠服务。不过,团购需要组织一定数量的购买者才能操作,时间周期长。而他可以提供即时服务,快速成交。

一张明晃晃的菜刀图片,菜刀上标着“沈阳砍价网”,这就是刘皓为“砍价网”设计的LOGO。刘皓表示,为了节省成本,网站制作与维护均由他个人完成。网站上的商品价格要低于市场价20%-50%。

刘皓坦言,“砍价网”的市场前景非常大,在市场经济条件下,消费信息的不对称使砍价服务有了很大的空间。

据《沈阳晚报》

票贩子分五等 年收入最高300万

本报讯 适逢春运高峰,许多旅客为买不到火车票而犯愁窝火。曾投资创办旅行社并向票贩子批发过火车票的李先生向记者曝黑幕:票贩子分五等,一等票贩子年收入可达300多万元。广大旅客这段时间在窗口买不到票是正常的。

现任一家私营拍卖行董事长的李先生很熟悉倒票内幕。他说,票贩子看似散兵游勇,其实却有一整套严密的网,贩票队伍由过去的单打独斗,发展到现在,形成了购票、倒手、拉客、成交一条龙“完整运作体系”。

李先生告诉记者,目前的票贩子大致分为五个等级,第一等就是从铁路直接拿票的,全哈尔滨也就十几个人,他们是大票贩子;二等的也就是和一等票贩子熟识的人;三等的是从二等票贩子手里能拿到票的。到了车站广场就是四等、五等票贩子了。他还透露,一等票贩子好的时候一年能赚300多万元,二等的也就是60万元至70万元吧,再往下的也能挣30万元左右,最底层的票贩子每年也有3万元左右的利润。

据记者了解,李先生所说的一等票贩子,每年能从铁路部门拿到几万至几十万张车票,这样,每年有数百万张火车票落入了票贩子手中。票贩子靠非法倒票,牟取暴利。

1月18日,为掌握票贩子的拿票过程,在李先生的指点下,记者来到某火车站的团体售票处。记者在此驻足片刻便发现了问题:来此购票者互相之间都认识,另外他们和售票员也很熟悉。买票前这些人要先递上一张条子,条子大都是在便签上写的字,结尾处只有一个姓。售票员在接过小票后,看一眼,便从电脑中出票。

李先生证实,这些基本是第二、第三档票贩子雇来排队买票的人,而且这个售票时间一般旅客不知道。

据李先生讲,大票贩子为了长期倒票,经常给车站及铁路的关系人送钱送物,这样一方面可以长期繁忙,同时也能逃脱查处。

“票控制在少数人的手里,因此在春运最繁忙的时候,普通旅客买不到票是必然的,如果碰上这个时间买到票了,纯属偶然!”对倒票早已厌恶的李先生一语道破天机。

当记者问到铁路警方也经常抓票贩子吗?李先生摇摇头说,铁路公安抓到的多是最后层次的票贩子,从铁路直接拿票和往外批发票的人,他们根本就抓不到。

据《新都市报》

新闻时评

时政点击

宁波社区直选 小政府大社会

宁波市的社区直选,选聘分离等尝试,所遵循的同样是以大多数义工代替专职社工、以居民自治为主代替行政管理为主、以“小政府、大社会”模式代替“大政府、小社会”模式的社区自治道路,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单纯看户籍的传统习惯。

截至2007年年底,宁波市所有的城市社区居委会完成了直选,成为全国首个城市社区全部实现直选的城市。有专家认为,此举不但促进了城市基层民主的扩大,而且创新了社区管理模式,规范了城市社区选举程序,对全国有良好的借鉴作用。

事实上,在社区层面推行社区居民自治,实行选聘分离、义工为主的管理模式,是社会发展的必然。

各城市自行拟订符合本地实际的社区自治办法,而各社区的日常工作,则完全交给这些由社区自行推荐产生、不脱产、不占编制的组织及其义务人员管理,所有这些为社区服务的组织,都是非政府、非赢利性质。在这种体制下,政府行政主要承担制度和法规制订者、仲裁者和协调者的角色。

这种模式最大的好处,首先是提高了社区服务的效率。由于所有社区服务人员都是由社区居民推选,乐意为本社区服务的义工,他们一方面有强烈的社区归属感和服务意识,另一方面也对社区的特点、需要和不足知根知底,工作、服务也能做到有的放矢。由于行政部门不直接参与社区内部管理,而只是间接参与指导和监督,避免了不必要的内耗。

其次,也降低了政府行政成本。由于社区自治,政府可以仅在社区一级配置最低标准的专职社工,并将社区行政拨款大大降低,而不必担心社区功能弱化。这样就可以确保宝贵的行政人力、财力投入到更急需的领域。

宁波市的社区直选、选聘分离等尝试,所遵循的同样是以大多数义工代替专职社工、以居民自治为主代替行政管理为主、以“小政府、大社会”模式代替“大政府、小社会”模式的社区自治道路,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单纯看户籍的传统习惯,而把在本社区务工和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员也列入候选人行列。这些努力同样收到了提高社区服务效率、减少政府行政支出的预期作用。

在中国,类似宁波形式或符合各地特色、其他形式的公民自治,应该越来越多、越来越普遍地出现在全国众多地方。因为公民自治是社会进步的需要,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。所以,宁波市的尝试,值得引发全国性的思考与借鉴。 陶短房

冰雪灾害考验政府“防寒机制”

此次冰雪灾害持续10多天,在南方造成的灾害却是50年一遇的。一些专家认为,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南北气候差异,此外,还与南方相对薄弱的“防寒机制”有关。

通过近日媒体的报道不难发现,正是我们本可以把握的“防寒机制”出了问题,才会导致现在面对突然而至的冰雪灾害措手不及。“防寒机制”之所以出现问题,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:一是防范意识上不够重视;二是具体措施存在缺陷。

不少南方地区的政府部门,在观念上认为防寒是北方地区需要考虑的事情,再加上最近几年“暖冬”之说开始流行,似乎冬天真的不会冷了一样。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,在制定当地生

产计划、安排当地群众生活的时候,自然就很少会考虑“防寒”问题。而今年的冬天,却一反常态露出了它寒冬的本来面目。这对从防范意识上就准备不足的政府部门来说,更遑论采取具体的防寒措施了。因此,我们可以看到,面对持续十多天的冰雪天气,各地政府部门采取的都是临时的“应急措施”,而不是常规措施。

意识本来就不够,在一些具体的措施上更是问题多多。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本次武汉市遭遇50年不遇的冰雪低温天气,市区多处供水管道冻裂,造成大面积停水事故。事后检查得知,很多供水管道本身的抗冻能力就不够,一些供水设施采用的材料甚至存在以次充好、粗制滥造等问题。这在天气正常的时候,勉强可以应付,而一旦天气发生变化,就会“掉链子”。这不能不给我们相关的政府部门敲响了警钟。再比如贵州省因为冰冻天气,造成供电设施倒塌、电缆断裂的问题,也是供电部门当初在建设的时候对恶劣天气估计不足,导致这些设施、电缆在承重、抗冻设计上存在缺陷。

冰雪天气还在继续,高速公路封闭、铁路旅客滞留、群众生活受到影响等坏消息还在不断地传来。不管事后如何补救,影响和损失已经造成,但政府相关部门起码可以借此反思“防寒机制”上的不足,为以后或许更加恶劣、极端的天气做好准备,以免再次出现像今年这样手忙脚乱的情况。 苑广阔

物业费空转实到底谁说了算

北京市地税局局长王纪平近日透露,北京市已率先向国家税务总局提交物业费“空转实”申请,最快今年6月份北京将开征物业费。记者获悉,除北京外,多个城市向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递交了物业费“空转实”申请方案。

从目前的报道看,物业费一直由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运作,但并未提交人大,甚至连国务院也没有讨论。

如今,物业费又可能“空转实”实施,这种仓促让人担心;有关部门有没有将民意看作征收物业费的基础?

作为针对国民财产征收的税种,开征物业费首先应避免重复征税。目前既对房产转让收入征收营业税,又按照增值部分征收土地增值税。物业费如果再开征,有可能与现存具有物业费特征的土地增值税、房产税一起构成重复征税。

一项政策的推出都应先考虑到是否立足国情,适应民意。且不说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对如何评估不动产、物业费税基和税率等问题没有一个清晰的“路线图”,单就程序来说,物业费这样一种牵涉面非常广的税种,必须在开征前征求公众意见,并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深入讨论和审批,而决不能仅由税务部门 and 财政部门说了算。 沈峰

石家庄改名算什么提案

河北省政协委员陈玉提议石家庄改名引起舆论关注。不少网友的评论和批评很尖锐,有的指责参政者滥用话语权,该提的不提,比如物价问题、收入差距问题,为什么不替百姓说话?有人嘲讽“拿名字作发展说事,委员难道是算命先生?”还有干脆就说这个提议很无聊,是不是吃饱了撑的?

石家庄不改名为何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关注呢?问题恐怕不仅仅是石家庄这个名字的重要,更重要的是政协委员的提议。人们真正关心的是政协委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议?委员应该怎样参政,其提案或建议要不要讲究质量。政协委员代表人民参政议政,务必珍重那份责任,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发言和交提案的机会。然而每遇两会,总有一些代表和委员的表现令人失望并引发公众的质疑。比如,有些人当了多年的政协委员却拿不出一提案;有些委员“现炒现卖”地弄出提案来凑数,结果不是被指为“小学生水平”,就是闹出笑话;还有些委员专门找那些无关国计民生、偏离参政主题的内容来提交

毫无意义的提案,比如“妇女节”改“女人节”,“圆明园遗址”改“圆明园残址”……叫人哭笑不得。所以,这次陈委员的“石家庄改名”提议一曝出便遭猛烈炮轰,于其本人来说也许是咎由自取,而广大公众所反感的则是两会中的“笑话提案”这种现象,以及这一现象背后所存在的参政者对参政资源的浪费问题。

“石家庄改名”之所以广受关注,实际上是公众在关注两会的会议质量和代表委员的质量问题,更深层折射出公众对民主参政的渴望。 马涤明

一支烟熏倒多少部门

福建云霄县生产的假烟,销售网络竟然能够覆盖大半中国!不得不令人疑窦顿生:如此令人触目惊心的网络,他们是怎样构建的?他们为何能够构建?

假烟从位于中国东南的福建省云霄县,长距离运输至中国东北的黑龙江、西北的甘肃、西南的云南,中间要经过多少环节,遭遇多少次检查,却一直安然无恙。如果不是2006年9月份一个平淡无奇的举报电话,这个销售网络可能依然藏匿在水面以下。

从这个惊天大案的诸多细节不难发现,假烟从材料供应、生产、运输到销售,至少涉及烟草、交通、公安、铁路、民航和交警。但是,这一存在多年的生产销售网络,确是在被人举报后才被发现的。这些执法部门为何如此迟钝?这么多部门为何管不住一支香烟?

本案中被抓获的30多名主要犯罪嫌疑人中,有两人是烟草系统的工作人员。他们明确地告诉购买假烟的客户,如何应对烟草稽查人员和一旦查获如何处理。根据本案中的主要犯罪嫌疑人交代,并提供了实际案例佐证,只要在福建省境内,运输假烟的车辆被警察查获后,根本不用下车,立即联系配送商,保证十分钟内“摆平”。本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李某,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利用铁路货运整车皮地从贵州、湖北贩运假烟。国家对运输香烟有十分严格的规定,铁路有关部门为何没有发现?根据专案组人员介绍,目前已经发现,民航已经成为一些高档假烟的运输通道,他们到民航部门了解案情的时候,却发现已经有人通风报信,销毁了证据。

近年来,我国烟草和公安等部门密切合作,打击制造、贩卖假烟的力度不断加大,效果十分明显。以烟草大省河南为例,2005年,查获假烟5.63亿支,91名制假分子被判刑;2006年,查获假烟6.29亿支,168名制假分子被判刑;2007年1月至10月,查获假烟3.55亿支,177名制假分子被判刑。即便如此,河南省打击制造、贩卖假烟的形势仍然相当严峻,许多制造假烟的窝点仍然没有铲除。

据烟草行业内部人士透露,烟草打假存在“割韭菜”现象,即打破了一个销售网络,过了一段时间就又恢复或者重建,端掉了一些窝点,不久以后,在附近可能又出现新的窝点。实际上,没有相关部门官员提供保护或者参与其中,制造、贩卖假烟难乎其难。

从这个近年来全国最大的制假假烟案中,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,制假假烟猖獗的背后总隐动着腐败的身影,要想摆脱烟草打假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的困局,不仅要打击制造、贩卖假烟的犯罪分子,更重要的是打击为他们提供保护的腐败分子,这才是烟草打假标本兼治的良策。 亚相